

24 第十七辑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83
湖南人民出版社



(021) 长沙工业史料前言	章扶中
(801) 长沙工业史料前言	章扶中
(001) 长沙工业史料前言	章扶中

目 录

我所知道的爱国实业家范旭东	章扶中 (1)
我研制煤气车和从事煤气车事业的回顾	向 德 (35)
我所创办的三家民营工厂	彭度阶 (48)
正圆动力配件厂的创立和发展	戴子骥 (57)
浏阳编炮、烟花的生产与销售	王殿生 (65)
邵阳的土纸业	陈新宪 肖学悦 陈伯斋 (74)
益阳铸锅业的历史	罗士奇 (83)
长沙的竹艺雕刻	袁 涤 (90)
一度闻名中外的菲菲伞	欧阳佩华 (96)
左学谦的生平事略	黄曾甫 黄曦龄 (101)
解放前的长沙米粮业	彭绪坤 屈先俊 李芸青 熊伯鹏 (117)
近百年来长沙绸布业的变迁	梁泽润 梁文聪 (144)
从鸿兴钱庄到鸿兴银行	张国岱 (159)
长沙照相业史话	朱振三 (162)
我所经营的雷同茂瓦货店	雷韵伯 (171)
湘潭药材行的经营情况	张秀文 (179)
衡阳著名中药店敬一堂	杨达三 (188)

衡阳宝华书局和新文化书社

..... 衡阳市民建、工商联史料工作组(190)

德茂隆的香干子..... 彭芝亮(193)

徐长兴的吊炉烤鸭..... 徐家麟(195)

长沙市商民协会的回忆..... 陈伯勋(198)

大革命时期的衡阳商民协会

..... 肖伯麟遗稿(205)

津市旧商会概况..... 津市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210)

三十年来改造历程的回顾..... 杨灏湘(217)

解放前的长沙米粮业

彭绪坤 屈先俊 李芸菁 熊伯鹏

湖南盛产稻米，历年远销南北各省，夙称“湖广熟、天下足”。滨湖各县，向被目为“鱼米之乡”。据一九三六年《长沙经济调查报告》引国民党政府主计处估计，湖南之稻作面积为二千六百五十万亩，其常年收获量为一亿〇七百八十万担。同上资料记载：“湖南每年出口谷米，除因战年政府禁止或限制出口外，每年约在二、三百万担之间。长沙因系一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水陆交通枢纽，自清末起，粮食贸易日益兴盛，与九江、芜湖、安庆合称中国“四大米市”。据同上资料引海关册载，一九二四年，长沙谷米出口量达二百三十多万石，最旺年份谷米交易额在八、九百万石以上。

解放前，我们都先后在长沙经营过米粮业。现将我们知道的情况叙述如下。

一、米粮业的四个部分

长沙经营米粮的行业，过去统称米业，包括碾米（碓坊、米厂）、粮栈（仓库、堆栈）、粮行（花粮牙行）、米店（零售米店）等四个部份。它们相互依存，而又各自独立。

1. 碓坊米厂

粮食加工经历碓坊与机器碾米两个时期。据本行业前辈传述，约当十八世纪初叶即清朝雍正以前，长沙尚无碓坊。那时城市食米是由小商贩从易俗河、靖港等地运来供应，或由富裕农民肩挑车运进城出售，有些住在城里的地主家庭则自备碓具，由长工或佃户舂成精米，除自用外，余均出售。雍正初年，湖广（湖南与湖北）分治，长沙定为湖南省会，食米需要量随人口增加而相应增长，有些富裕农民将舂米工具搬进城来开设碓坊。这种独立劳动的手工业小作坊，一面加工零售食米，一面利用糠碎养猪。到十九世纪末叶（光绪末年）全城的碓坊发展到五百余家，大都分布于南起碧湘街北至草潮门的沿江一带，尤以潮宗街最多，人称“米街”。这时，较大的碓坊有五、六套碓舂和其他相应的设备，操作多雇用工人，其中主要是流入城市的农民。这种碓坊已开始成为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有的还兼营外销。随着碓坊的发展，牛碾坊（习称磨坊）也陆续出现。因为它的生产工具粗笨，牲畜放牧又需水草，所以大都设在城郊。

碓坊、牛碾坊用以加工的原料，一是收购商贩由河道运来城的稻谷，二是承存居住城市的小地主租谷，三是承接官仓（清称“皇仓”），义仓每年换储的积谷，还有一种更重要的来源，是官僚地主的租谷。这些大地主拥有大量田产，各在城内建立大规模的仓廩，每年秋后，将租谷运到城河，双车（农民秋收时已用风车吹筛一次，地主收租时要再车一次）进仓。如贡院街曾国藩家、府后街曾国荃家、司马里左宗棠家、营盘街杨载福家，柑子园李星沅家。潮宗街瞿鸿禨家，小东街刘权之家，文星桥委永庆家，西园陶澍家、通泰街周慕莲堂和胡五福堂，太平街朱云谷堂，

以及叶德辉家等等，他们的仓廩都能容二、三千石至四、五千石不等。据说藩府坪官僚大地主唐鲁英家的仓廩可储谷一万余石。这些地主仓廩总容量约为三十至四十万石。各碓坊主夤缘自通，或经粮行介绍，向其成批购进。辛亥革命以后，封建官僚家族逐渐没落，有的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化，但此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这种地主仓廩租谷、仍为碾米业原料来源之一。

二十世纪初期，长沙米粮业的碓坊生产已经不能适应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因而逐渐向机器工业发展。一九一八年，本帮商人袁久安从上海购来卧式打米机和电动机各一部，开设茂丰米厂，日出白米百石左右，一时轰动全市。继袁之后，本帮巨商饶菊生、张达聪等在潮宗街开设义丰粮栈兼营电机米厂，浙帮陈德载在马家巷开设兴记机器米厂，又在靖港开设一家机器米厂。兴记采用当时较为先进的“神仙龙骨”机具，设备规模胜过别家。不久，又有浙帮陈楚材在西长街开设永丰机器米厂，规模较兴记尤大。约在一九一九年，一部分米厂采用了德商西门子洋行运来的小型马达及稻谷加工机件。

在外来新式生产工具的影响下，茂丰米厂袁久安与王植记铁铺老板王植庭签订合同，仿制碾米机器。王到汉口参观碾米机后，仿造出两部米车和几部铁推子，为茂丰改进、扩充了生产设备，王植记也发展成为制造厂。其后，市内又出现汉德制造厂，承制各种机械米车和推子。长沙本地能制造部分打米机器，促进了碾米业的发展。

这时，许多碓坊、牛碾坊也纷纷改营或合伙转营机器米厂。先是李佑荪将李永盛碓坊改为米厂，营业大振，同业竞相仿效。如周石麟在皇仓街改营乾裕米厂、王伯卿在鸡公坡碓坊原址改营王春和米厂，谢子威在北正街改营咸和米厂等。但因电力供应不

足，常有停车现象。一九二〇年，光华电灯公司开始发电，电力负荷增大，各米厂的生产逐渐转入正常。此后十数年间，新开米厂日多，外业或外省商人投资办厂的也不少，如春茂钱庄傅南轩开设祥丰机米厂，德茂钱庄曾文元开设大成机米厂，新化陈留馥堂开设兆丰机米厂，长沙木商喻某开设楚丰机米厂，江浙帮徐祖鑫开设祥丰机米厂，李子铭开设阜丰机米厂，上海厚德杂粮号派来代理人陈益生开设厚德机米厂等等。到一九三四年，长沙机米厂发展到九十六家，碓坊则减为一百五十余家。

机米厂所用稻谷的来源，中小户主是要通过粮行买进，大户则直接向产区收购。其加工生产的米主要是供本身销售，包括运销出口、门市零售和由粮行居间成批出售；其次也代客户碾米，赚取加工费。米厂一般只从事稻谷加工；但也有极少数厂搞其他品种加工的，如李永盛米厂加工糯米、油粘米、具有特色。该厂对十字糯、万载糯、浏阳糯、红粘、稻生粘、纯油粘的碾制，讲求质量，任客挑选，能满足本市广大消费者的要求，尤其受到糕点作坊和甜酒、汤元等小食店的欢迎，并有一定数量运销沪、汉等地。

长沙粮食加工业开始形成行会，是在十八世纪中叶的乾隆初年。当时，根据长沙一府两县的区域划分（大致以现五一路分界，路北属长沙县，路南属善化县），两县碓坊都有庙会。长沙碓坊设立雷祖殿（在今通泰街），善化碓坊设立神农殿（在今织机街）。这种“殿”实际已是封建行会组织。它的活动，包括检校量器（斛桶、升子），解决某些有关共同利益的问题，并于每年三月十五日分别举行一次神会，长沙祀雷祖，善化祀神农。凡两县所在的碓坊及后来的粮栈，经两家同业介绍，得申请入会，并按资金多少，规模大小，缴纳一定数目的会金和年费。光绪年

间，碓坊被规定要向官厅领取营业执照，可以世代承袭。雷祖、神农两殿也从这时起制发牌照。依照惯例，善化的碓坊不得在长沙辖境营业，长沙的碓坊也不得在善化辖境营业。加入庙会者可以分享皇仓、义仓积谷的赊销权利。辛亥革命以后，皇仓改名储备仓，为官方积谷备荒的仓库；义仓又名社仓，为地方公益事业的积谷仓库。每届农历五月，估计当年无粮荒不需作赈济之用，即由官府或慈善单位将积谷交由庙会经手，赊销入会各户，至新谷登场时，按本息归还。未入会者或零售米贩不得享此权利。清末民初，雷祖殿选出总管谢子咸（北正街咸和碓坊），值年谢三和（北正街三和碓坊），神农殿选出总管李佑荪（金家码头李永盛碓坊）、值年周石麟（在鳌山庙开设碓坊），王伯卿（在鸡公坡开设碓坊）。一九二六年左右，两个庙会合并，改为米业同业公会，由李佑荪、周石麟、谢子咸先后任公会主席。一九四四年改制，由谢绍秋任理事长，直至解放。

前面提到，早期的碓坊在加工原料上依附封建地主经济。其实，米粮业后来的一些大户，如傅南轩、聂云台、伍芷青、李文玉、陈留馥堂等，也都是资本家兼大地主或官僚地主。他们所收租谷有的多达十多万石，如聂云台单在滨湖种福院，即年收租谷约六万石，棉花约一万五千石。而且，一般粮商致富后，也多将很大一部份利润购置田产。据碾米业公会不完全统计，该业资方两百多人中兼地主的达五十九人，占田一万五千多石，收押金三万余元。长沙米业有较长的发展历史，但后来始终没有较多的资金用来扩大生产规模，也很少以其所增殖的资本大量投资于其他工商企业，上述情况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因素。

2. 粮栈、仓库

随着碾米业务的发展，粮栈、粮行也陆续出现。原来粮栈自取的牌号都是“××栈”，商场习惯相称时，加了一个“粮”字。有些栈是亦官亦商的豪门所开设的。如朱雨田除了开设乾升栈兼营黑茶、盐和粮食外，还开设了一家专营粮食的乾益栈，聂云台开设了协丰栈。两栈容量各为十余万石，专供自储自营，不寄客货。另有一些栈系碓坊、米厂附设，如李永盛米厂兼营阜丰栈。有的是碓坊改营，如黄佩石将久兴福碓坊改为协和栈。大革命前，长沙就有商人专门开设的粮栈，如草正街的义福、水道巷的德安、中山路（今百货公司旧址）的永和等。也有不少粮栈系其他行业的资本家投资经营的，如江西帮乃康钱庄郑莲生，谦和银号严瑞初，分别开设稷丰栈（碧湘街），中和栈（碧湾街），李文玉金号开设润丰栈（九如码头），裕顺长钱庄开设裕民栈。上述德安栈的老板李寿增，既开药铺，又开钱庄，义丰栈老板饶菊生既做绸布，又做南货。大革命后，陆续出现粮栈多家，至一九三七年，全市粮栈共有十八家，总容量约四、五百万石。另外，金融界也有自建粮仓的，如交通银行在灵官渡建立可容粮十余万石的仓库，复兴银行建立粮仓三处，中国银行也有以姜维良出面设置的仓库一所。大陆、金城等银行为招揽粮商以粮押款，增赚利息，还委托殷实可靠的瑞记、德安等栈代存、监管押款粮食，名为“特约堆栈”。此外还有粮栈兼营米店，如市中心的万源正米店兼营“义全”粮栈。一般商人经营的粮栈，在早期主要是代客储存。抗战前，存粮每石每月栈费为银币二分五厘，以两月起算，超过两月则按日计算，并须扣除小量损耗。有的粮栈也受客户委托，代至滨湖一带采购粮食。由于两地粮价有二至四角的差距，客户可以减少进

价，粮栈享有承储权利。代储合约上一般规定：如遇天灾人祸，栈方不负赔偿责任；客户欲免重大意外损失，须向保险公司保险。但各栈对粮食质量的保管，如防止虫、鼠、雀害和潮湿、霉变等工作，一贯比较讲究。代客储存者，均力求保持信誉，不使存粮遭受损失。

清末民初，粮栈也按长沙、善化两县区划，分属雷祖殿、神农殿。一九二六年左右，两个庙会合并，改为米业同业公会时，各栈另行成立粮栈业公会，由黄佩石任公会主席。一九三八年，黄任省商联合会主席后，由李寿增继任，改称理事长。一九四五年，因储存范围扩大，不限于粮食一项，改名仓库业，成立仓库业同业公会，仍由李寿增任理事长。

3. 粮行

粮行原系牙行之一。清代中叶，长沙粮行与鱼行并为一业，合领官帖。至清末，两业分立。开设粮行时，须先向藩台衙门缴纳三百两白银，问藩署转请北京清政府颁给牙帖。光绪年间，改由县衙转请颁帖，辛亥革命后，直接向财政司领帖。

当碓坊初兴，分立雷祖、神农两殿时，粮行与鱼行、土果行共同在小西门河边成立了一个行会，名为“水府庙”。后来，粮行业分了出来，在盐运坡单独成立“财神会”也于每年三月十五日集会，祀神（财神）、聚餐、演戏。一九二六年左右，成立粮行业同业公会后，财神会仍继续存在。前者系行业老板们的组织，后者老板、店员、学徒都可以参加。入会者须缴纳一笔会金（民国初年，每一学徒也须缴纳银币十元）。该同业公会设在大西门正街，初由黄志周、曹福生分任正副主席。一九三四年改称理事长，由曹福生担任。一九四四年起，由曹海鲲继任，直至解放。

粮行早期的业务是介绍买卖和代客买卖两种。前者多由米客和船家向产区收购，或托产地经纪代购，然后运来长沙，由粮行代为客户买主，成交后，向卖方收取佣金（谷子每石约为银币二分，米每石约为五、六分至一角不等）。抗战期间，有些粮行开始从事自购自销。抗战胜利后，基本上改为自营。以后发展起来的粮号或花粮号（多系江浙帮粮商开设）则完全自营购销，或兼代外埠客商采购。

粮行都设在沿河一带，俗称西湖桥一带为上关、大西门一带为中关、草潮门一带为下关。三十年代，上关粮行有八、九家，中关有十五家，下关约十家，共计三十多家。上关、下关主营谷米，中关除谷米外，兼营棉花、豆麦及其他杂粮，故亦称花粮行。抗战前，上下两关业务最旺者，有徐石琴的广泰厚粮行，涂国卿的大生粮行等。此外，还有以（米）厂兼（粮）行的，其中经营较为出色的有屈仲鹿、刘启超、陈树成等人。当年大西门码头系长沙水运吐纳咽喉，江面满泊货船，埠上大西门河街、外正街、内正街一带集中粮、鱼、蛋、油盐、花绞、绸布、土果、酒酱、麻搭诸业，联成一片闹市。外正街为粮行业中心所在，业务特盛，其商业地位可与八角亭并列。因其经营范围广泛，货源除前列产区外，尚有一些品种来自湖北，其中棉花多来自荆门，杂粮多来自新堤，石膏多来自应城。为便于花粮小品种的囤储，各家粮行都自设小栈房，有的就设在店内。各类货物，除谷米大宗销粤、沪、汉和部分销本市外，棉花主销湖南纺纱厂及宝庆（邵阳）、醴陵、衡阳等地的弹花铺；豆子（包括黄豆、蚕豆、川豆、绿豆、泥豆）及芝麻等，一部分销本市豆子铺，另一部分销杂粮店和较大的豆腐铺（小豆腐铺向豆子铺分购）；麦子主销面粉厂，数量不大。

抗战前中关粮行规模较大者，有正和、正有、源泰、镇泰隆。

颐庆几家、另有恒升、万茂、大茂、三正、大有等行。正和有资金几十万元，行主谭晓洲，先后经营和兴米厂、长沙面粉厂、裕康钱庄等，为本帮负有声望的工商户之一。中关粮行也造就出不少米业人才。彼时，长沙工商界就业务专长、交游宽广、活动能力等方面，评鹭高低，公认颐庆、源泰、永泰、人和四家管事的（经理）常承仁、陈瑞琪、罗南山、胡德彪为花粮行的“四大金刚”。其中常、陈、罗三人都是从粮行学徒出身当上老板的。

4. 米商

这里所称米商，仅指零售米店（铺）、米摊而言。早期的碓坊，主要为应门市需要而从事粮食加工。机器碾米业发展起来以后，一部分米厂附设门市，极少数米厂以门售为主。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及其分布区域的扩散，陆续涌现很多兼营食米和其他货品的杂货店，同时出现了一批专营的零售米店。凡供应城市富裕居民的食米，无论米厂门市或零售米店，概须经过精碾，将齐米（糙米）、元熟米或谷子碾成上等熟米，方受用户欢迎。如长沙大成米厂（别于粤帮大成行米厂）专从附近四乡收购质量较优的小河谷，碾成特级、头机白米，并在木牌楼设立分销处，主营门市，价钱虽比一般贵一些，但销路很俏。各零售米店或兼营油盐南货及其他杂货的店铺，其共同特点之一，是本身几乎都设有粮食加工的生产设备。并且这些店主多系米粮业的内行，即从碓坊、米厂、粮行出来的店员、工人，同米厂车间有人缘，可以取得谷米加工的便利。有的店子是受淘汰的小碓坊转业的，因其本身没有改装新式生产设备的能力，原有的工人又已转到机器米厂，坊主只好改营米店。上述这些店子的货源，或自米厂、粮行贩进，或从河边船上收购，或向近郊农村采办，一般都由店主自己或雇工挑运。

开设零售米店首须选择码头。因为有的是以大商店的厨房及富人的住宅为销售对象，所以店子以靠近商业、交通中心区为宜。如原系同兴米厂师傅的张亮陶，在金线街开设米店，专门供应八角亭、司门口、坡子街一带用户，他摸透了各家用粮品种、数量和有粮，缺粮的时间等情况，主动及时送货，颇受用户欢迎，生意做得顶活，成为行业中知名的一家小店。有的以穷苦市民为对象，店子设在贫民集中区，如过去的便河边一带。有的以船民为对象，店子设在湘江沿岸，如金家码头就有这种米店多家，有几户还以供应轮船上的火舱即炊事房师傅为主要业务。这种顾客，就轮船每隔数天行驶于长、汉、沪的机会，每次私带大米一两包，可赚取一笔地区差价，由于往返频繁，供销数字累计起来也很可观。这些专营或兼营食米零售的店铺，资金都很微薄，一般中小户只有三数百元，大一点的也不过二、三千元。它们已逐步形成了一个自然行业，早在一九三四年左右，即达四百多家。但因货源多受米厂、粮行控制，市场为其操纵，各项条件都不能与之抗衡，加以力量分散，在历史上从未有过自己的商会或行会，一直到解放前，始终没有成立同业公会组织。

二、米粮业的两个“黄金时代”

长沙成为全国性米市之一，与外销业务的扩大是密切相关的。清末，湘米外销渐多，但限于交通条件，运输流转缓慢。一九〇三年（清光绪二十九年），长沙辟为商埠，外轮经常从上海、汉口，来到长沙。帝国主义轮船公司往往携带食米，闯关漏税，偷运出境。随后，本市有些米厂自雇木帆船运米至汉口，行销十分畅旺，不久，上海南市裕泰等行招揽湘米销沪，并有招商局的轮船代运，

以是大大打开了上海市场，还可视沪、汉利润大小而空航向。由于水运发达、供销繁荣，沿江一半，粮商麇集。这时，金融界的申票、汉票汇兑也更趋活跃。

由于外销业务的发展，促使滨湖、湘中、湘东、湘南各地，包括南县、华容、汉寿、沅江、常德、益阳、宁乡、湘阴、浏阳、醴陵、湘潭、衡山、衡阳等县的商品粮食汇集长沙，其中以滨湖最多，湘南较少。远至永州（零陵）等县，如遇丰收年成，也有大量稻谷船运来长。

历届湖南省政府对湘米外销沪、汉等地，一向未加限制，但对运销广州则有时开放，有时禁止。原先，销粤湘米只能船运，绕道上海，需时一月左右。一九三六年，粤汉铁路全线通车，适逢湖南粮运解禁，车运只要两天，时间短，周转快，而且粮食脱售后，可带回适销的工业品，往返均有厚利可图。仅以湘米运粤的单程利润而言，装米一卡（八万斤）至穗，可净赚银币一千元。在高额利润刺激下，米粮业和外业商人以及市面游资掌握者，对经营湘米外销，趋之若鹜。江浙帮在长沙开设的米厂和少数本帮米厂，全部从事加工业务，把加工的米外销沪、汉、京、津各埠，粤帮、潮帮、河南帮粮商，相率加强在湘经营粮食的活动，粤帮且在长沙设立德安、惠隆、南栈等庄，办理采购，兼营代销。长沙帮的若干大户，也在广州及汉口两市设庄，销沪业务则委托当地厚德号代办。从此，湘米南至潮汕、东至闽沪、北至京津，四方畅销，盛极一时。随着长沙粮食集散量越来越大，粮行自营囤积或外销的也日具增多。一九三五年左右，大小米厂仅九十余家，粮栈约七十家，储谷数量约为一百一十万石。粤汉路通车后至长沙大火前，大小米厂达一百七十六家，粮栈八十多家，总储量达七、八百万石。平日各栈仓库几无空隙。米厂、粮行、粮栈年终

盘红，都获厚利，有的超过对本对利。长沙工商界称这几年为米粮业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这时，长沙部分米厂的生产工具开始进入新的变革阶段。以前，各机米厂大多采用湘造汉式或其他类似设备，性能上都存在一些问题，如去杂不够纯，洁白度不高。对后一缺点，多少年间采取的一个补救办法，即于碾米时掺入一些湖壳粉，等于人工增白，使其美观。一九三六年左右，曾文元开的大成米厂（在大西门正街），从广州购来一套协同和机器厂制造的半自动化磨米，碾米机器，据说是一个德国工程师设计的，原销暹罗（泰国）、缅甸等国，机件性能先进，生产效率高，碾出来的熟米，质量、色泽均佳。这套设备中有一部分筛，能自动分离出节米、碎米、稗子、谷粒、砂子等杂质，在长沙是前所未见的。这事不久被元生米厂老板胡德彪知道了，暗中也去广州买来整套同样设备。他们互相竞争，互相保密，均不外传，以致最能适合当时生产发展要求的新式装备，未能在全业推广。

一九三八年的“文夕大火”，给长沙米业造成惨重损失，米厂、粮栈幸存者，仅草潮门德安、高永和两家及南门、北门外几户，共十二家半（泰丰粮栈烧了一进）。上述两家的半自动化机器也一同毁于大火。据不完全统计，经过那次兵燹，长沙米业共损失固定和流动资金约达银洋一千万元以上。大火前夕，虽因强敌压境，粮商心存观望，未敢大量进货，但仓储仍有二百余万石，大火中烧掉一百九十余万石。企业职工一千八百余人，流离失所，很多资方人员及其家属仅能携带若干细软，逃奔外县。长治路年丰米厂经理冯鹤生，因家空业尽，无法生活，投河自杀。

一九三九年初，部份粮商（包括米厂主）和流散职工陆续回长，在残垣废墟上搭起仅能暂避风雨的棚屋，从事小规模经营。

幸存的少数机米厂，因无电源，除后来有几家采用柴油机动力，恢复机器生产外，其他各家只好重新修起碓坊、牛碾坊，恢复人力、畜力碾米。各粮栈因仓库与储谷同归于尽，仅有少数重建复业。除德安等栈因未罹浩劫，仍属专营外，多数粮栈，如仁丰、吉成、兴和等，均改为仓、厂合一，即以仓库代替车间，在其中装设碾米机器，进行生产，故有仓库米厂之称。

后来，在敌我两军相持于新墙河一线，长沙处于苟安的局面下，城市人口陆续迁回，上海等地又有部份工厂内迁入湘，增加了对粮食的需要，同时出现数量颇大的军粮加工业务，米粮业渐有起色，米厂、碓坊、牛碾坊陆续复业。另有一大批以国民党军官黄槐为代表的、与军政当局或粮官们沾亲带故的人，临时找个地方，搞几部泥推子，也来承接军粮加工任务。这种所谓碾米商约有七、八十户。他们靠米省田粮处一纸命令，强迫碾米业公会接纳他们为会员。但这一时期，整个行业因灾后元气丧尽，及粤、汉、沪直达交通断绝，除军粮加工外，仅有门市销售业务，发展终属有限。一些大户如常承仁、王友生等，早赴衡阳改做花纱、桐油、颜料等买卖去了，留在长沙的都是一些中小户。至于那些摇身一变、投机倒把的人，既无经营能力，又无确实资本，稍一亏累，便无法弥缝，牌子一臭，粮政当局也不敢再给他们加工任务了。所以不久之后，这些碾米业“会员”也就无形消失了。

一九四四年长沙沦陷时，米粮业资方和职工再次疏散，仅有少数人在敌伪统治下继续营业。其中有一名叫罗婷婷的女子，挂起“方裕米厂”的招牌，仰承敌伪鼻息，大做军粮加工生意。这家厂子是敌伪时期长沙唯一的机器米厂，所以业务独盛。

抗战胜利后，长沙米粮业重整旗鼓，战时的碓坊，牛碾坊陆续恢复机器生产。初因电力不足，大都采用蒸气发动，有的用汽

车引擎发动。不久长江复航，接着粤汉铁路也恢复通车，国民党省政当局对湘米入粤，再次开放，外销业务重振，许多米厂进而更新机械设备。一九四七年仁丰、吉成先后从广州运回全套广式碾米设备，仁丰还请来一位广州技师，专事维修。稍后，长沙若干机器制造厂仿造出广式砬机。米车因仿造未成，仍由广州供应。至此，多数米厂改装了广式或湘造广一式机件，湘造汉式机具逐渐淘汰。凡已更新设备的厂子，碾米时不须再掺潮壳粉，米色自然洁白。可是战前那种性能特优的分筛机，早已在市场绝迹。这是因为当初大成、元生两家企图独占竞争优势，相互对那部机器保密，以致失去重置或仿造的机会。但与抗战前比较，这时粮食加工业的生产力还是有所提高，米粮市场重新活跃，许多外帮粮商又纷纷来长复业。其中资金雄厚、生产规模和吞吐量很大的广东大成行，即于此时在长开业。全行业除竟营湘米外销外，还出现标买和承接“救济物资”加工的大量业务，市场呈现一片畸形繁荣景象。至一九四八年，大小米厂达二百六十多家，包括砬坊、生碾坊三十四家，全业工人约二千余人。工商界称这一阶段为米粮业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三、粮商牟利之道

米业老板们在粮食加工的生产过程中，无不力求使工人付出尽可能多的无偿劳动，从而成为他们利润的泉源。砬坊时期，推谷，舂米，叫做正工，都是繁重的体力劳动。砬坊主采取以筹计工，规定每个工要做满四排筹，每排十根，每根要舂三百脚左右。砬咀通常重五、六十斤，工人双脚踏舂，日达一万余次。如未满足额，即按少做筹数扣减工资。机米厂兴起后，